

● 课外体育培训 ●

“体育外卖”模式的基层机遇、实施困境与未来展望

王旭东, 张强弓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通过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 系统探讨了在《2025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背景下, “体育外卖”模式在基层的发展机遇、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 该模式在政策支持、民生需求增长及社区资源激活等方面具有显著机遇, 能够有效满足群众个性化、便捷化的体育服务需求; 然而, 其在服务质量与安全保障、监管机制协同性、区域供需匹配等方面仍面临系统性挑战。对此, 应通过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创新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与差异化服务供给等策略, 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可持续性。“体育外卖”模式对完善基层体育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普惠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需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 体育外卖模式; 2025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 群众体育; 监管机制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6)02-0098-05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6.02.017

“The Sports Takeaway” Model: Grassroots Opportunitie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WANG Xudong, ZHANG Qiangong

(Hubei 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062)

Abstract: Employ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mplementation predicamen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sports takeaway" mode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Key Priorities for Mass Sports Work in 2025.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model enjoys remarkable opportunities in policy support, the rising demand for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 activ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public's need for personalized and convenient sports services. Nevertheless, it still confronts systemic challenges in aspects such as service quality and safety guarantees, the coordination of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the matching of regional supply and demand. In respons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service quality and operational sustainability,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 standardized service system, innovating a multi-department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longside differentiated service provision. The "sports takeaway" model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grassroots sports service system and advanc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mechanisms.

Keywords: sports takeaway model; 2025 key points for mass sports work; mass sports; regulatory mechanism

近年来,我国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过程中,逐步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基层体育建设的新途径。部分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健身托管”等形式,引导社会体育组织深入社区,承担群众体育服务。2021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提出,要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使体育设施更加贴近社区与乡村生活,鼓励多样化的体育服务供给^[1]。此后,各地相继出台配套政策与行动方案,基层体育改革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后,2025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2025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导向^[2]。《要点》提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展群众体育服务渠道,并在青少年体育、场地安全监管、赛事组织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这些举措既为社会体育组织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创新型体育服务模式的诞生创造了空间。在此背景下,“体育外卖”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育服务形态,凭借其便捷性、个性化和即时化的特点,逐渐在群众体育领域崭露头角。该模式不仅契合了现代都市生活中日益普遍

收稿日期:2025-10-16

第一作者简介:王旭东(2002~),男,湖北十堰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通信作者简介:张强弓(1972~),男,湖南湘阴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E-mail: 6343793084@qq.com。

的“碎片化运动”需求,即利用工作间隙、通勤等待等零散时间进行短时、高频的体育锻炼,也体现了“运动零食”理念所倡导的将日常体力活动拆解为多次短时、中低强度运动的健康促进策略。该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体育培训服务在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为基层体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主要围绕上门体育培训模式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展开研究,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推动其健康发展,满足群众体育需要。

1 “体育外卖”的概念

“体育外卖”是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将专业的体育培训服务、健身指导、运动康复等体育资源,以“外卖”的形式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实现体育服务的个性化、便捷化和即时化。“体育外卖”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基层体育服务形式,其本质是通过专业体育指导人员响应群众需求,到达用户指定的地点开展个性化健身辅导。这种模式巧妙结合了数字技术和移动网络的便利性,精准应对当代社会对高效、灵活和隐私健身服务的多层次需求。

从服务主体来看,“体育外卖”模式主要包含两类供给方:一类是完成工商注册,取得体育培训资质的机构主体,这类主体通常依托《要点》倡导的“规范化运营”要求,构建了涵盖课程研发、师资管理、安全保障的完整服务体系,能提供从基础体能训练、中考体育专项辅导到球类技能培训的系统化服务^[3];另一类是具备专业资质的个体教练,主要由体育院校在读生、退役运动员或持证社会体育指导员构成,这类主体凭借《要点》支持的“社会力量参与”政策空间,以灵活服务为优势,通过社区推荐、家长口碑传播等方式对接需求,可针对青少年肥胖改善、运动兴趣培养等细分需求定制单次或短期训练方案,适配基层家庭“碎片化运动需求”^[4]。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推动,未来“体育外卖”有望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成为基层全民健身的重要推动力量。

2 “体育外卖”模式的基层机遇

2.1 政策环境的制度激励

“体育外卖”作为一种灵活的基层体育服务形式,其推广与普及高度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制度环境。国务院《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强调“激发消费活力,鼓励个性化体育服务下沉基层,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并提出通过财政激励和市场机制,扩大体育消费规模至 2025 年的 5 万亿元以上^[5]。近年来,我国政府密集发布了一系列针对群众体育的指导文件(表 1),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基层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为创新服务模式如“体育外卖”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政策对群众体育培训的

引导经历了从“规范治理”到“创新激励”的转变。早期政策聚焦于行业规范,通过“双减”政策将体育培训纳入非学科类管理,明确其作为学校教育补充的定位,为市场划定合规边界^[6]。随着政策体系完善,支持重点逐渐转向服务创新与资源下沉。《要点》首次提出“支持上门体育培训等新型服务模式”,并将其作为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重要抓手,通过这些政策“体育外卖”能更好地融入社区治理体系,促进居民健康素养的整体提升。

2.2 民生需求的现实驱动

基层群众对体育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与日俱增,成为“体育外卖”模式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双减”政策与中考体育改革的双重推动下,基层家庭的体育需求呈现结构性爆发,政策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压力和学科类培训压力,释放了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信号中小学生的体育运动需求被释放^[7]。近年来体育中考制度逐步完善,尤其是 2020 年以来体育科目分值和比重大幅增加,甚至部分省市的体育科目分值达到与语数外等科目持平水平,体育中考的升学因素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青睐于体育培训,《2024 年中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分析报告》显示,超过 68%的家长表示需要为孩子安排校外体育培训,其中近 40%的家长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上门指导的个性化服务。特别是在中考体育项目等方面,“体育外卖”模式能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指导,有效解决了基层家庭接送难、时间紧的现实困境。因此,民生需求从问题转化为机遇,让“体育外卖”在基层社区中迅速定位,在满足群众痛点的同时,实现模式扩张和发展。武汉市自 2024 年起在部分社区悄然流行“上门体育课”,居民通过线上平台或社交媒体预约教练即可预约到家门口的跳绳、体能训练等专项指导,吸引了大量学员参与,显著缓解了学生家长“接送难”的痛点。北京朝阳区则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健身外卖”,居民可以像点餐一样选择羽毛球、瑜伽等项目,由认证教练携带器材进入小区公共活动室,满足了不同家庭个性化、多样化的体育需求。这些鲜活的案例表明,政策红利叠加民生需求,使“体育外卖”模式在基层迅速找到发展空间。

2.3 社区资源的高效激活

社区资源是基层体育发展的基础,包括场地、器材、志愿者和本地组织,这些器材闲置在小区、社区里,往往没被充分利用。在《要点》的推动下,“体育外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资源的作用。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强社区体育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强调要“激活闲置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提升利用率”,把社区的零散资源连成一片,形成高效的基层网络^[8]。基层社区现有资源丰富多样,主要包括物理

表 1 近年来国家颁布的基层群众体育相关政策汇总

颁布时间	政策名称	颁布机构	核心内容摘要
2021 年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国务院	构建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推动“15分钟健身圈”建设
2022 年	关于加强基层体育组织建设的意见	国家体育总局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管理
2023 年	促进体育数字化转型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推进“互联网+体育”融合,提升在线服务能力
2024 年	基层体育“15分钟健身圈”实施方案	国家体育总局	优化设施布局,增加上门服务试点
2025 年	2025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	国家体育总局	创新供给方式,财政支持便捷健身模式

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组织资源。具体而言,现有的物理资源涵盖小区内的小型广场、绿地、健身路径和闲置空地,这些往往嵌入居民生活区,给上门教练提供了训练场地。器材资源包括社区公用的跳绳、哑铃、瑜伽垫等简易设备,以及居民自有的家庭健身工具,给教练提供更加丰富的训练器材。人力资源则涉及社区安保人员、体育爱好者和社区工作者,他们具备本土经验和热情,可以更好的和上门教练合作。组织资源则指基层体育站、居民委员会和民间社团,这些机构已具备初步协调能力,家长可与组织协调训练场地。这些资源在传统基层体育中多处于低效或闲置状态,上门体育教练的介入可以充分发挥社区资源的作用。以上海“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为例,该模式通过社区嵌入式建设实现了资源激活。上海于2021年起在各区推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至今已在多个社区建立,累计服务百万余人次。在这些资源中,老年人可以在家门口接受公共基础健身器械使用、健康检测、慢性病干预指导、社交活动等服务^[9]。这种“社区+场地+服务”的融合形式,既减少了老年人出门负担,又把社区资源转化为持续可用的运动服务载体。

按照“10—15分钟健身圈”的建设标准,社区内已建成健身角、多功能运动场、口袋公园等多样化运动空间,这些场地距离居民生活区步行可达,彻底打破了传统体育培训对专业场馆的依赖^[10]。对“体育外卖”而言,这种举步可就的场地优势不仅大幅降低了服务交付的地理门槛,更通过缩短服务半径提升了基层家庭的参与便利性,完美契合政策要求的“就近就便开展健身活动”目标,同时为“碎片化运动”的高频次开展提供了物理支撑。相较于传统模式需承担的场馆租赁成本,社区场地的灵活使用显著优化了运营效率,为模式在基层的可持续扩张提供了物理支撑。

3 “体育外卖”模式的实施困境

3.1 服务质量与安全保障的系统性隐患

在《要点》的实施框架下,“体育外卖”模式虽获政策倾斜,但服务质量与安全保障领域的系统性隐患已成为基层推广的显著制约因素。在实践中,因服务链条的分散性与监管机制的缺位,形成了贯穿师资、课程、场地的系统性隐患,与政策要求存在显著落差。师资方面的隐患突出表现为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缺失,基层“体育外卖”依赖指导员的直接介入,但当前从业者多为兼职或初级人员,持证率和培训深度不足。通过调查发现体育指导员队伍整体学历水平偏低,相关理论知识的能力有限,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指导服务,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结构不合理,不利于队伍可持续化、高质量发展^[11]。其次,行业尚未建立针对上门培训的师资准入标准与培训体系,群众仅凭教练员单方面提供的资质进行参考,资质等级分级多样,直接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课程体系的隐患则在于内容设计的碎片化和科学性欠缺。受运营成本与市场需求影响,上门体育的教学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体育教育培训市场因政策缺位形成监管漏洞,这为多数机构的违法违规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行业运行层面,成熟的管理制度与教学机制尚未建立,直接导致2大问题:一是课程教学高度同质化且易复制,培训服务与产品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难以形成独特卖点;二是教学规范性严重不足,“想到哪教到哪”的随意性突出,“内

容未形成系统课件、课程未构建完整体系”的现象普遍存在,教学质量缺乏稳定保障^[12]。场地安全与责任界定的模糊性则构成安全保障的核心隐患,“体育外卖”依托社区空地、家庭院落等非专业场地开展服务,此类场地普遍缺乏专业运动场地的安全配套,教练对服务场地的事前安全排查机制缺失,多在抵达现场后临时判断场地适用性,难以全面识别潜在隐患。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安全责任界定不明,现有政策未明确“体育外卖”场地安全的责任主体,平台、教练、场地提供方的权责划分模糊,一旦发生运动损伤事故,易出现“责任推诿”现象,导致降低基层群众对模式的信任度。然而,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中存在资源供给不足与智慧化建设滞后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非专业场地的安全性与服务效能^[13]。

3.2 监管机制与经济可持续性的碎片化挑战

“体育外卖”模式虽迎来发展机遇,但在监管机制与经济可持续性方面仍面临显著挑战,这些挑战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制约了模式的健康扩张,这一挑战源于监管体系的分散性和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导致模式稳定性与公平性难以保障。监管机制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主体多元与执行脱节,基层“体育外卖”涉及体育行政、市场监管和民政等多部门,但职责划分模糊,缺乏一体化平台。一些地方对上门体育培训教练的资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特定的证书和培训经历;而另一些地方则相对宽松,这导致了市场上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14]。这种不统一的标准使得从业者和消费者都难以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次,监管执行主体权责不清,平台、教练、场地提供方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界定。在“体育外卖”服务中,教练依赖社区空地或家庭院落开展培训,但场地安全排查机制缺失,事故责任主体模糊。若用户在非专业场地运动受伤,平台、教练与场地提供方易陷入“责任推诿”,降低群众信任度。此外,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建立,体育、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在资质审核、价格监管、内容合规等方面的联动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监管碎片化。

经济可持续性的挑战则突出表现为资金链的不稳定与盈利模式的单一化。尽管“体育外卖”模式在基层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受季节、天气等因素影响,消费者对上门体育服务的需求会有所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兴趣和需求也可能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导致市场需求的不稳定。在中考体育改革期间,对中考体育专项辅导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但改革结束后,需求可能会迅速下降,这给“体育外卖”模式的经济可持续性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完善监管机制,规范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增强“体育外卖”模式的经济可持续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群众体育事业。

3.3 市场需求分化与供给结构失衡的发展矛盾

在《要点》的实施进程中,“体育外卖”模式面临市场需求分化与供给结构失衡的深刻发展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了基层体育服务的动态张力,需求侧日益多样化,而供给侧仍显刚性与不均衡,导致模式匹配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加剧。当前市场需求集中于两类:一类是中考体育专项提升,此类需求占青少年第三方课外机构订单的72%,家长更关注短期提分效果;另一类是兴趣培养与体适能提升,但这类需求因盈利周期长,课

程设计复杂,尚未被供给端重点关注^[15]。现体育市场上,“应试型”需求成为供给主流,但“健康型”需求因课程设计复杂、盈利周期长,仅有少数的机构能提供适配服务,这与《要点》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背道而驰。与之相对应的供给结构失衡则是矛盾的另一极点,表现为资源分配的非均衡和能力建设的刚性不足。“体育外卖”供给主要依赖个体指导员和小型平台,但城市之间供给能力悬殊,上门体育兴起于一二线城市之间且高端社区家庭的需求量大,对于三四线普通家庭而言上门体育理念尚未流行,大部分家长更愿意相信体育培训机构,导致上门体育指导员更倾向于大城市上门培训服务,三四线城市供给则严重滞后,指导员数量不足、设施简陋,覆盖率低,多依赖散户或兼职人员,这一配置失衡根源于政策资金和人才流动的“马太效应”。总体而言,这一失衡趋势在《要点》供给侧改革的导向下,若未通过资源均衡、主体培训和市场规范予以矫正,将进一步制约“体育外卖”模式的基层效能和可持续性。

4 “体育外卖”模式的未来展望

4.1 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筑牢质量与安全根基

针对服务质量与安全保障的系统性隐患,“体育外卖”模式的未来展望在于构建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师资专业化、课程模块化和场地风险防控,筑牢质量与安全的根基,实现从隐患频发向可靠普惠的转型。首先,师资标准化是体系的核心基础。依据《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第12条,明确课外培训教练的基础资质门槛机构教练需同时持有《体育培训经营许可证》与专项教学证书,个体教练需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证》并完成“上门服务安全专项培训”,由省级体育部门联合行业协会搭建“师资资质查询平台”,实时公示教练资质信息,杜绝“无证执教”或“资质造假”,解决群众难辨资质真伪的问题^[16]。其次,“体育外卖”依托社区空地、家庭院落等非专业场地,存在地面不平整、障碍物未清理等隐患,且安全责任主体模糊,易出现“责任推诿”。参考山东省消协警示中指出的非专业场地风险,制定《“体育外卖”非专业场地安全规范》,明确不同场景的基础要求,社区空地需确保地面无坑洼、无尖锐障碍物,家庭院落需预留至少2 m×3 m的无遮挡训练空间,且需远离水电隐患点;要求教练上门前填写“场地安全评估表”,拍摄场地照片上传至平台,经平台审核通过后方可开课,杜绝“未排查隐患即教学”的情况。总体而言,这一标准化体系将化解师资、课程、场地隐患,推动“体育外卖”在《要点》背景下向高质量转型,惠及基层群众健身。

4.2 创新协同监管模式,破解碎片化治理难题

当前,基层体育服务监管面临多部门职责交叉、执行标准不统一、跨区域协同不足等碎片化问题,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首先,明确监管主体与职责边界,建立联合监管机制。由体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教育、网信等多部门参与的协同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体育部门负责教练资质与课程内容备案审查;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平台运营资质、价格行为及合同规范监管;卫生健康部门指导运动健康风险防控与急救标准制定;网信部门则负责线上平台信息内容的合规性管理^[17]。通过建立“牵头部门归口管理、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协同机制,彻底解

决政出多门、责任模糊的问题。其次,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依托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外卖”服务监管子系统。要求所有运营平台接入该系统,实现教练员电子资质证书验证、服务合同在线备案、用户评价信息收集与风险预警等功能。通过数据共享与交叉比对,监管部门可对教练执业行为、课程内容、收费标准等进行动态监测和智能分析,实现对跨区域、跨平台服务的精准监管和非现场执法,大幅提升监管效率。未来,随着监管机制的完善,“体育外卖”模式将更加规范、透明,为基层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体育服务,助力《2025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工作开展。

4.3 优化供需匹配机制,促进均衡协调发展

为有效破解当前“体育外卖”模式存在的供需错配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未来应着力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机制,推动服务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惠及基层群众。首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服务差异化、精细化发展。鼓励和支持服务提供商跳出同质化竞争陷阱,基于市场需求细分,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产品。针对青少年群体,可开发中考体育冲刺、运动技能培养等课程模块;针对中老年群体,可推出慢性病运动干预等特色服务。通过深耕细分市场,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供给格局,全面提升服务适配性和用户满意度。其次,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与区域均衡布局。落实《要点》提出的推动全民健身资源向基层倾斜要求,探索建立“体育外卖”服务资源跨区域调配与共享机制。支持头部平台通过技术赋能、管理输出、人员培训等方式,带动中小型服务商特别是县域地区服务商共同发展。鼓励采用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模式,通过线上平台整合分散的教练资源,实现跨区域、跨平台的智能调度与优化配置,有效破解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优质教练资源不足的困境。通过以上措施,构建起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体育外卖”模式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局部繁荣向整体发展的转型升级,真正成为普惠可及的基层体育服务新载体。

5 结语

在《要点》指引下,“体育外卖”模式的出现为基层体育服务的供给方式带来了新的思路,该模式在政策引导与群众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然而,从实践角度来看其在质量保障、监管协同以及区域均衡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未来的建设应注重标准体系与长效机制的完善,尤其要提升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建立透明的监管机制,并实现资源的区域共享。总体而言,“体育外卖”模式的推广不仅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也为提升基层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提供了新的路径,其健康发展将为实现全民健身目标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1-08-03)[2025-09-04].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3/content_5629218.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2023-03-08)[2025-09-0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3/20/content_5747513.htm.
- [3] 李湘浓,修文丽.“双减”政策下体育培训产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研究[J].体育学刊,2022,29(6):64-70.
- [4] 武汉文明网.武汉兴起“上门体育课”[EB/OL].(2024-09-04)[2025-09-04].http://hbwh.wenming.cn/rdjj/202409/t20240904_8650557.html.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5-09-04)[2025-09-0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39164.htm.
- [6] 温悦,罗亮,孙晋海,等.“双减”政策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治理路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2,42(5):22-32.
- [7] 董美,丁英.“双减”政策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的发展: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轮驱动视角[J].体育教育学报,2024,40(3):32-39.
- [8] 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EB/OL].(2020-10-10)[2025-09-07].<https://www.sport.gov.cn/8443/n10503/c965504/content.html>.
- [9] 国家体育总局.上海推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老年人有了家门口的专属健身房[EB/OL].(2024-03-21)[2025-10-03].<https://www.sport.gov.cn/n20001280/n20001265/n20067708/c27581742/content.html>.
- [10] 国家体育总局.“15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幸福半径”[EB/OL].(2019-09-18)[2025-09-08].<https://www.sport.gov.cn/n20001280/n20745751/n20767239/c21563277/content.html>.
- [11] 袁谦,李小英.武汉市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体育指导活动的现状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3,13(9):81-84.
- [12] 王戡勳,沈克印,方千华.“双减”政策之下的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培训:机遇、困境与策略[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2):240-248.
- [13] 甘雨晴,刘如,张继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J].湖北体育科技,2025,44(1):103-107.
- [14] 邵媛.挑战与应对:“双减”政策下我国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实践逻辑[J].体育教育学报,2024,40(2):16-20.
- [15] 中国报告大厅.2024年体育培训市场规模分析:青少儿体育培训市场规模为2350亿元[EB/OL].(2024-11-07)[2025-09-14].<https://www.chinabgao.com/info/1253479.html>.
- [16]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的通知[EB/OL].(2021-12-17)[2025-09-14].<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3835973/content.html>.
- [17] 黄谦,谭玉蛟,王铨皓,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诠释与实现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3):297-306.

(上接第32页)

- 15168436.html.
- [18] 任敬奇.体育“饭圈”治理:法律缺位、法益冲突与主体协同[J].湖北体育科技,2025,44(6):22-27.
- [19] 中国新闻网.侵害中国女排国手张常宁名誉权案一审宣判[EB/OL].(2022-05-20)[2025-06-07].<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2/05-20/9759854.shtml>.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安部公布4起打击整治涉体育领域“饭圈”违法典型案例[EB/OL].(2024-08-15)[2025-06-07].<https://www.mps.gov.cn/n2254098/n4904352/c9700940/content.html>.
- [21] 黄越,吴亚婷.体育“饭圈文化”的衍生逻辑、现实困境与归正之道[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5,44(1):131-137.
- [22] 吕鹏.科学构建体育领域“饭圈”治理机制[J].人民论坛,2025(3):88-91.
- [23] 陈青.体育追星“饭圈化”风险与应对[J].青年记者,2022(4):44-46.
- [24] 人民日报客户端.陈芋汐夺冠后被网暴,抖音回应[EB/OL].(2025-05-28)[2025-06-07].<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9199500-500006286095>.
- [25] PEARSON R. Fandom in the Digital Era[J]. Popular Communication, 2010,8(1):84-95.
- [26] AGRAWAL A, GUPTA A, YOUSAF A. Like It but Do Not Comment: Manipulating the Engagement of Sports Fans in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2018,18(4):340.
- [27] 刘艳红.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134-152+204-205.
- [28] 毕雨辉,董新有.体育饭圈暴力的现实表征、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J].体育学刊,2025,32(1):52-60.
- [29] 刘品新.电子证据的关联性[J].法学研究,2016,38(6):175-190.
- [30] 刘永刚.浅析英国对足球流氓的法律规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6):43-45.
- [31] 徐加豪,陈家起,高奎亭,等.从“异象叠现”到“理智归序”:体育“饭圈文化”审视与消解[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5,39(3):53-62.
- [32]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体育总局2023年度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EB/OL].(2023-03-31)[2025-06-07].<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01395/c25447958/content.html>.
- [33] ROMERO-JARA E, SOLANELLAS F, MUÑOZ J, et al. Connecting with Fans in the Digital Age: an Explorator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in Top Football Clubs[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10(1):858.
- [34] 刘艳红.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198-216.
- [35] 李露豪,张大志,田文波.体育饭圈乱象治理的理论探究与实践进路[J].体育学刊,2025,32(1):45-51.
- [36] 张勇.新媒体视角下体育“饭圈化”的成因与治理[J].新媒体研究,2025,11(2):60-63.
- [37] 佚名.两部门严打网上体育“饭圈”问题,处置账号7.6万个[J].廉政瞭望,2025(7):12.
- [38] 丁彦尹.情感纽带的畸变:体育饭圈化乱象探析[J].浙江体育科学,2025,47(1):27-33.
- [39] 杜超伟,倪京帅.从“圈地自萌”到“文化破圈”:体育“饭圈”动态转型的驱动逻辑与治理策略[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5,42(2):247-256.
- [40] 苏雄华,刘忠福.网络暴力行为的刑事定性之困境及其破解[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5,37(2):10-21.
- [41] 毕潇潇.人格权侵害禁令研究: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J].东方法学,2022(3):173-184.
- [42] 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J].比较法研究,2021(3):138-151.